

程一鸣回忆录

群众出版社

程一鸣回忆录

(内部发行)

群众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程一鸣回忆录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75印张 73千字

1979年7月第1版 1979年7月第1次印刷

内部发行

定价：0.30元

出版说明

程一鸣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达三十一年之久，曾担任过国民党军统局西北特区少将区长、澳门站站长等职。一九六四年在我党和政府的伟大政策感召下，毅然起义，回到祖国。这本书是他一九七六年写的回忆录，对了解国民党军统局组织机构、历史沿革及活动情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现由我社编辑、出版，限在公安机关内部发行。涉及到一些人和事均未经核实，希读者在阅读时加以注意，不要公开引用。

群众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七日

前　　言

这本回忆录的主要内容是揭发蒋帮特务组织的内幕。

蒋帮的特务组织是绝对秘密的。局外人固然不易理解，就是参加特务组织的人们，也不易知道它全部的内幕。

有些人是自愿参加特务组织的，有些人是被骗上了贼船，有些人则是贪生怕死，叛变投特。这些人虽遭遇不同，但都成为蒋介石的帮凶。

我在特务的黑地狱里耽了三十一年后，终于冲破了地狱之门，才有机会写这本回忆录。

在这本回忆录里，我把蒋帮特务组织的演变和它的滔天罪行写下来，把我的亲身经历叙述出来，作为历史的见证。

复兴社特务处，是仿效德国希特勒军事法西斯秘密组织的产物。特务头子戴笠是蒋介石的化身，特务处是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缩影。他们妄想用几个打手，几支手枪来维持黑暗的反动统治。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一开始就形成三条支流，但都是卖国的投降派。

一条支流是“蒋家天下，陈家党”的“CC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局”；

一条支流是蒋介石嫡系“黄埔系”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一条支流是汪精卫卖国贼的汉奸“特工总部”。

抗日战争时期是这三帮特务的全盛时代，蒋介石真反

共、假抗日的真面目在这时也充分暴露了出来。

汪精卫公开向日本军国主义投降，蒋介石则是暗藏在抗日阵线中的卖国贼，以后又同美帝公开勾结，造成今日台湾的局面。蒋介石和汪精卫是一丘之貉。

“国防部保密局”的出现，已是蒋家王朝濒临复没之日。尽管它垂死挣扎，到处杀人放火，但终也挽救不了蒋家王朝的灭亡。

中国大陆解放时，蒋介石逃往台湾。在美帝的保护下，蒋介石将他的长子蒋经国推出来，充当蒋帮的特务头子，设立了“国家安全局”。蒋介石死后，蒋经国同样把特务、警察、军队作为维持反动统治的支柱。

社会主义的祖国越来越强大，蒋帮的处境越来越孤立。“国防部情报局”曾几次派遣武装特务偷渡大陆，骚扰捣乱，却都以失败而告终。结果只好关起门来，捏造大陆情报，已到了日暮途穷。

以上这些都是蒋帮特务组织的特点和它所处时代的背景。

我在特务的黑染缸里浸染了三十一年，不可能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又因为年老，记忆力衰退，印象模糊；加上个人的水平有限，这本回忆录中难免有很多错误和缺点，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我写这本回忆录得到了领导的鼓舞，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程一鸣

目 录

一	青少年时代	(1)
二	参加革命	(4)
三	党的哺育	(9)
四	怎样做了特务	(14)
五	国特的发展	(19)
六	复兴社特务处	(22)
七	特务头子戴笠	(27)
八	特务的职能	(33)
九	特务的训练	(36)
十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41)
十一	特种技术合作	(45)
十二	“曲线救国”	(50)
十三	军统局西北区	(53)
十四	夺取胜利的果实	(57)
十五	军统局结束后的几个公开机关	(61)
十六	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	(65)
十七	我和特务训练班	(69)

十八	国防部保密局.....	(73)
十九	刽子手毛人凤.....	(77)
二十	国家安全局	(81)
二一	美帝走狗郑介民	(84)
二二	国防部情报局.....	(89)
二三	骗子叶翔之	(92)
二四	美蒋特务在港、澳的罪恶活动	(99)
二五	我和蒋介石彻底决裂.....	(103)

一 青少年时代

我写这本回忆录时，已是六十九岁的老人了。亲身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历史过程，亲眼见过旧中国人民过着苦难屈辱的日子；也见过新中国人民当家做主人，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在这大半生中，我做过一些坏事，也做过一些好事；有过进步的和反动思想的剧烈斗争。

一九〇七年农历六月二十五日，我生在广东省香山县第四区亨美村一个侨工家里，即现在广东省中山县南蓢公社亨美生产队。中山县原是珠江三角洲上的一颗明珠，“三冬无雪，四季常花”，拥有几万亩肥沃的沙田，是一个富饶的鱼米之乡。可是，在旧社会反动政权和帝国主义，地主恶霸的重重压迫剥削之下，贫富极度悬殊，广大劳动人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不少人被迫漂洋过海，流落他乡。

当美国总统林肯解放黑人奴隶的时候，我的祖父被美国招工到了旧金山（圣佛兰西斯科），给美国资本家当奴隶，修筑铁路。

一八九三年我父亲十九岁时，被我祖父带到旧金山一家中国餐馆里当杂役，艰苦地工作了十三年，积蓄了几个血汗钱。一九〇六年我父亲先将大部分钱汇回来，又随身带了一点钱，便乘轮船经由香港返回家乡。在船上父亲被专门诱骗

赌博的赌棍引诱参加了赌博，输光了身上带的一点钱。回到家乡时已经三十二岁的父亲和邻村崖口一位十七岁的农家女结了婚，她就是我的母亲，翌年生下了我。

我父亲回国后在英国殖民地香港干诺道一家我母亲同族的资本家开设的“新全安栈”旅店靠接客取得佣金和得到旅客的一点赏钱来维持家庭生活。因为我父亲在美国多年，能讲一点英语，从各地来香港的轮船抵达停泊码头时，我父亲就站在码头上迎候旅客，争取他们到“新全安栈”去住，并代旅客向香港海关官员进行贿赂，避免旅客行李被抄查的麻烦。

旅客到了“新全安栈”，店主按接得旅客多少给我父亲佣金。有时旅客上街买东西，要我父亲当向导，替他们拿着购买到的东西，旅客一时高兴，有时也会给我父亲几个赏钱。

我八岁入私塾读书。十岁那年村里设立小学，我在小学读了六年。毕业后进入南蓢墟的“云衢中学”。入学才几个月，我母亲病死。父亲续娶，后母要我停止上学，在家里做家务，引起我对家庭的不满，父亲便将我送到上海去当学徒。

一九二四年的元宵节后，我离开家乡到香港，在香港搭乘轮船前往上海谋求生活。走时，父亲给我做了几件新衣裳，给我几十块银元，送我上了轮船。

在船上我睡在船舱内一排一排的甘蔗上。轮船开动后，我晕船呕吐。昏昏迷迷地度过几天后，我发现自已被抬出了船舱，才知道轮船已经到了上海金利源码头。

到上海后，我住在北四川路仁智里一家“憩环俱乐部”里。不久，我堂兄介绍我在虬江路一家“广东汽车公司”当

学徒。

这个公司是一位葡萄牙资本家姬普鲁开设的，专修理汽车。我去了以后，言明要我做三年学徒，如果中途退出，就得给公司补还三年米饭钱。在那里我每天工作十小时，白天八小时，晚上两小时。由公司供给食宿，每月发一块银元算做工钱。

当学徒的经常受公司大班和师傅的打骂是理所当然的。上海工人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资本家的三重压迫和剥削，比其他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都要残酷。

一九二五年二月，上海的日本纱厂工人为了要求改善待遇，举行罢工。五月十五日，日本纱厂的资本家打死了工人顾正红，并打伤了十多位工人。同时公共租界的巡捕房也逮捕了很多工人。五月三十日，上海各校学生两千人支援罢工，号召收回租界，在属于公共租界的南京路举行示威游行，群众集会达万人之多。巡捕当场逮捕了几名学生，群众随着被捕的学生拥到巡捕房，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于是巡捕就向群众开枪射击，打死了四、五十人，这就是血腥的“五卅惨案”。

五月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号召上海人民举行总罢工，组织联合起二十万工人。

六月一日，上海开始总罢工，参加的工人二十万，五万学生罢课，许多商人也因此罢市。十九日，香港工人二十五万响应罢工。二十三日，美国帝国主义者在广州市沙面开枪打死正在游行的广州人民，引起一场省港大罢工，坚持了十六个月，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这些连续不断发生的资本家用武力镇压工人运动的惨案，使我逐步

认识了资本家和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

广东汽车公司由于投机失败而倒闭，我结束了学徒生活，获得了自由。以后我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和永安纱厂等处做机器修理工人。

一九二六年夏天，我从上海到汉口去完成我母亲的遗嘱。我母亲临死时曾嘱咐我：她有一位胞姊住在汉口法租界长春里，如果有可能，希望我到汉口去拜访姨母，表达她对大姊的怀念。我到汉口后，住在姨母家里，姨父把我介绍到大智门附近一家机器厂做工。

九月七日北伐军占领汉口，汉口的工人组织了工会，兴高采烈。于是，我第一次看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工人运动，给我留下了终生不能磨灭的深刻印象。

二 参 加 革 命

一九二六年十月我离开汉口，搭轮船返回上海，在闸北青云路青云桥光明电器厂做机器修理工人。这个厂是华侨广东人梁创开办的，经理是他的儿子梁柏芝。厂子生产“热心牌”热水瓶和各式各样的玻璃电灯罩。

我住在青云路一间民房的亭子间，楼上和楼下都住着上海大学的青年学生。楼上的学生往来要经过我的房门口。我傍晚放工回来就在房里读书看报。我同楼住有一位上海大学的

青年学生叫马异的，是广东省海南岛人。他常到我房里闲谈，问起我的家庭情况和喜欢读什么书报。他是我得以接受革命思想的启蒙者，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后我就没有再见过他。至今我还怀疑他是个党的领导人，是我终身难忘的好老师、好朋友。

当时上海有八十万工人，热情支持从广东省出发的北伐军。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起来罢工，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因为这次起义的时间过早，军阀孙传芳和上海租界的帝国主义者勾结起来，对起义施以残酷的镇压，使这次起义遭到失败，但他们并没有能摧毁上海工人的革命战斗精神。

有一天孙传芳的反动军队在北火车站附近，将一颗人头挂在电灯柱上示众，说这位被砍头的人是革命党人，引起路上行人的围观。我刚好经过那里，也挤到人群里去看了一下。晚上马异来到我这儿，我将看到挂人头的事告诉他。

我问：“什么是革命党？军队为什么要砍革命党人的脑袋？”

马答：“革命党人要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军阀，帝国主义和军阀都恨他们，所以勾结起来屠杀革命党人。”

我问：“什么是革命党？”

马答：“听人家说，革命党就是中国共产党，她是工人的党。”

当时我很惊奇，工人也有党？

我问：“我是工人，能不能加入工人的党？”

马答：“你是工人，当然可以加入工人的党。我是学生，也想加入，但不知这个党在那里。我和你分头去找，谁

先找到了就介绍另一个人入党。”我同意马的提议。

上海市的战争气氛越来越浓，街头小巷都在谈论：“北伐军快要打到上海来了！”

有一天马异来告诉我，他找到了中国共产党。

问我：“你是不是真的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说：“真的愿意！”

马要我写一张履历表和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志愿书，我按照他所说的写了交给他。

过了几天，马异来说：“中国共产党批准你入党，但要守秘密，不要向人洩露。”他给了我一本小册子《共产主义ABC》，要我好好阅读，又问了我有关光明电器厂的详细情形。马异要我将厂里的机器修理工人、吹玻璃工人、机器车间工人和烧热水瓶芯的女工一起组织起来，并启发我怎样向工人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人。

由于第一次接受党的任务，我很兴奋，竭尽一切所能，把厂里的工人组织了起来。

马异经常来检查我的工作，指导我怎样去从事地下党的活动，要我号召工人向厂方提出改善待遇的要求，遭到了经理梁柏芝的拒绝。马异问我：“能不能发动一次全场总罢工，再向厂方提出要求？”

我在厂里征求各车间工人的意见，告诉他们，如果大家同心协力联合起来罢工，厂方就不可能答应工人的要求。于是大家决定全体回家停止工作。厂方让工头劝诱工人复工，被全厂的工人拒绝了。当时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情绪激昂，并到处传说革命的北伐军快要打到上海，经理梁柏芝迫于形势，只好答应工人提出的要求。

一九二七年二月，北伐军迫近上海市，军阀孙传芳退守上海闸北区。二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提出支援北伐军的口号，领导上海工人起来总罢工，把这次总罢工变为第二次武装起义。

这时，蒋介石已经作好反革命叛变的计划，指示北伐军停止向上海前进；故意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同军阀做力量悬殊的斗争，以此削弱打击工人力量。军阀孙传芳趁这个机会，与上海租界的帝国主义者相勾结，把上海工人的第二次武装起义镇压了下去。当时我参加了这次武装起义，知道有一百多工人被枪杀，几百工人被逮捕。

三月二十一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再次发动总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有几十万，爆发了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袭击了华界的警察局、邮电局和北火车站。我率领工人纠察队夺取了反动军警的部分武器，埋伏在淞沪铁路的天通庵车站，准备袭击从吴淞乘火车来援助的反动军队。晚上，当列车进入天通庵车站时，埋伏在那儿的工人纠察队一齐开枪射击，迫使反动军队弃车向公共租界的靶子路逃跑。后来我们又围攻死守在东方图书馆内的驻军残余，在激烈的进攻下，敌人只得竖起白旗投降。

三月二十二日下午，解决了反动军队盘踞在北火车站的最后一个据点后，上海工人暂时取得了上海市的政权。这时北伐军才开始进入上海市，准备夺取上海工人经过流血斗争得来的胜利果实。

三月底，蒋介石和上海租界的帝国主义者、买办资产阶级及黑社会势力互相勾结，策划反革命的叛变。在叛变的前几天，蒋介石为了麻痹工人，派了一个音乐队，给上海总工会

会送了一面“共同奋斗”的锦旗，表示对上海工人的敬意。四月十一日晚，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被大流氓杜月笙骗去杀害。十二日，蒋介石利用上海黑社会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雇佣一批流氓，手臂上缠着白色“工”字臂章冒充工人，从租界潜入华界，向工人纠察队的指挥部进攻。蒋介石派军队跟着这批暴徒，借口“工人内讧”，要整顿秩序，一夜间全部解除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

十三日早晨，上海十多万工人和广大学生市民一起集会，向蒋介石提出抗议。会后进行了游行示威。当队伍来到宝山路时，突然遭到蒋军机关枪的屠杀，接着又封闭和取缔了上海总工会和其他革命团体，捕杀大批革命党人，仅在三天之内，就有三百多人被杀害，五百多人被捕，五千多人失踪。

上海工人经过“四·一二”大屠杀，进一步看清了蒋介石这个新军阀反对革命的真面目，在中国共产党高举的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下，更加坚定地进行着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我每天到各工厂区和一些工人联系，在反革命白色恐怖下继续和敌人展开斗争。八月，敌人对我加紧了缉捕。党为了我的安全，决定让我去苏联接受马列主义的教育。

三 党的哺育

一九二七年十月中旬，党通知我动身前往苏联学习，告诉我走的时候，在吴淞口江边有一艘舢舨等着我，并告诉我摇舢舨的人是怎样的面貌、身材，见面时彼此怎样问答等事项。我按照通知在吴淞口江边找到这艘舢舨，它把我送到江中一艘苏联货船上。

我是这艘货船的最后一位乘客，上了船就拔锚起航。这时从船舱内走出一群青年男女，他们都是到苏联去学习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共青团团员。他们跑到船面的甲板上欢呼跳跃，为能到列宁的故乡去学习而感到兴奋。我仰望着蔚蓝的天空，俯看着碧绿的海水，心情也很激动。大家一起唱着“国际歌”。轮船冲开波浪，向海参崴前进。

我们从海参崴坐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前往莫斯科。火车经过贝加尔湖时，苏联十月革命纪念节日刚过，从车窗还可看到一些城镇为纪念十月革命节的红星灯饰。

火车抵达莫斯科后，我们被安排进入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有人称它为“中山大学”，是为了纪念孙逸仙先生的。当时的校长是拉狄克，以后是米夫。

一九二五年米夫在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工作。一九二七年斯大林派他任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校长，共产国际